

公元三一六世纪鲜卑与高句丽 及日本关系之马具上的考察

董 高

辽西地区的鲜卑族(这里主要指建立前燕、后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民族)和辽河以东地区的高句丽族,马具是具有特征的随葬品之一。日本古坟时代晚期墓葬中也常有马具出土。尽管这些民族随葬马具的习俗有早有晚,但从马具的组成和特征上看,都存在着相同或近似的因素,而在我国和邻近的其它地区,则决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因此,许多中外学者都从马具入手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古代,尤其是公元三一六世纪的文化关系。然而过去的考察却往往忽视了曾在中国北方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鲜卑族,尤其是慕容鲜卑。本文试图以近些年来发现的鲜卑马具为基础,通过与高句丽(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马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他们之间的文化关系,并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公元三一六世纪鲜卑与高句丽 及日本关系之马具上的考察

董 高

辽西地区的鲜卑族(这里主要指建立前燕、后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民族)和辽河以东地区的高句丽族,马具是具有特征的随葬品之一。日本古坟时代晚期墓葬中也常有马具出土。尽管这些民族随葬马具的习俗有早有晚,但从马具的组成和特征上看,都存在着相同或近似的因素,而在我国和邻近的其它地区,则决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因此,许多中外学者都从马具入手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古代,尤其是公元三一六世纪的文化关系。然而过去的考察却往往忽视了曾在中国北方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鲜卑族,尤其是慕容鲜卑。本文试图以近些年来发现的鲜卑马具为基础,通过与高句丽(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马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他们之间的文化关系,并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以辽西朝阳为中心地区的鲜卑马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民族上，主要指慕容鲜卑，同时也包括受鲜卑文化习俗影响很深的汉人及其他不明种族的人，在时间上，主要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建都于龙城(今朝阳市)的前燕、后燕、北燕时期及其前后，在地域上，以朝阳为主，兼及鲜卑人足迹所至的其它地区。

迄今，朝阳附近发现鲜卑马具的墓葬已达10余座，主要分布在大凌河两岸的朝阳和北票二县。1956年和1979年在北票县章吉营子房身鲜卑墓地共发现四座墓，特别是1979年发掘的8号墓，出土的马具种类非常齐全。北票章吉营西沟村和大碾子也发现了同类墓。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附近也是重要的发现地点，先后发现了袁台子4号墓，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姚金沟1号墓、2号墓等数座，其中有丰富的马具随葬品的就有四座之多。在朝阳县他拉皋附近也有零星发现。另外，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的马具，因为冯氏是“随同夷俗”的汉人，所以也应视为鲜卑系统的马具。

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晋墓，出土的马具与朝阳鲜卑马具完全相同，所以墓主人可能是公元四世纪中叶前后到中原争战的鲜卑高级将士。此外，在赤峰市敖汉旗等朝阳近邻地区也曾有鲜卑墓葬和马具出土。

二、高句丽的马具

在今中国境内有高句丽马具出土最多的是曾作为高句丽都城的吉林省集安县，其次是辽宁省东部桓仁及附近地区。朝鲜半岛也是高句丽马具的重要出土地。

集安出土马具的高句丽墓，有万宝汀242号墓、78号墓、麻线沟1号墓、七星山96号墓、禹山41号墓、长川2号墓、洞沟古墓群等。在霸王朝山城上也出土了像马镡式样的桃形铁片饰件。在洞沟、五盔坟和舞踊冢等墓壁画上还可见到马具形象。

辽东地区在桓仁高力子19号墓和抚顺高尔山城也分别见到镡、轡、镫等马具。1960年发现的本溪晋墓，出土的鍍金马具饰件亦较多，时代定为两晋十六国时期，墓主人当是高句丽族或与高句丽文化有关的其他族。

朝鲜半岛的马具资料，见于报道的有冬寿墓、天马冢、金冠冢、饰履冢、金铃冢、银铃冢等等，其中尤以金冠和天马二冢随葬马具最为丰富，种类亦多。

三、日本的马具

日本马具出现在古坟时代后半期。可知有福冈县老司古坟、池之上6号古坟、大阪府丸山古坟、丹城邑古坟、大谷古坟等墓葬出土的马具，但在马具种类上有多有少，或只有衔、轡，或同出杏叶形饰件，或有鞍、镫，不尽一致。

四、马具的比较与分析

从马具的组合上看。包括安阳孝民屯晋代鲜卑墓在内的以朝阳为中心地区的鲜卑墓马具是最全的，有马面饰件、鞍桥饰、马镫、各种形式的泡饰、坠饰、带卡、带环、带箍、衔、镳等等，还有铁甲，可谓是鞍、勒、辔、镫俱全。而且，凡出马具的墓，在马具组合上都相同或相近，虽然从质料、工艺和数量上存在差别，但种类不可或缺。高句丽马具亦相当丰富，可是仍比不上鲜卑马具之全，目前还未明确见到像北票章吉营子8号墓和朝阳十二台子姚金沟2号墓那样的鍍金铜马面饰，泡饰也没有鲜卑马具种类多，坠牌饰常见的形式是桃形叶片，而鸟首形和圭首形及扁孔牌饰则少见或不见。日本的马具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实用性强，有马身上的必须用具镳、辔、鞍具、镫、铃、带扣等，其它装饰性强的饰件则少见，可知有为数甚少的剑菱形杏叶饰等。这说明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盲目的全盘照搬。

再从马具的形制演变上分析一下。马镫是马具中变化最大、特点最突出而又在以上各民族、地区均有出土的东西。朝阳鲜卑墓的马镫，大多有柄长、木芯外包铜皮，近似三角形、单镫等早期马镫的特点，冯素弗墓的马镫柄已变短些，镫轮也略呈弧圆形，形制上已进了一步。高句丽马镫与鲜卑马镫相比，在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比较进步的，而日本发现的马镫比高句丽马镫更有进步之处，显示出较晚的特征。鞍桥饰件，鲜卑墓的要比高句丽墓、更比日本的要雕刻精细、繁褥得多。其它各种泡饰、牌饰等装饰物，亦是高句丽和日本的均比鲜卑的简单、朴素，品类亦少。带卡、銜、镫等的情况亦是如此。

最后从时代上作一比较。朝阳鲜卑墓的时代，多在公元四世纪初至五世纪前半叶，即前燕、后燕、北燕时期，目前已发现出土马具的墓可早至三世纪，即前燕建国之前。集安和高句丽马具墓，据有关材料，最早的可能属万宝汀242号墓，时间是四世纪，早到三世纪的可能尚未发现，晚的则到六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出马具的墓葬一般在五世纪，早到四世纪的可能性很小。日本马具，最早出现当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五世纪中叶开始，马具的种类、形式，才日趋丰富起来，直到六世纪前半叶，马具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鲜卑与高句丽特点的马具几乎全部消失。

五、有关问题的探讨

鲜卑是汉代以后在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鲜卑慕容部在吸收录用了大量中原汉人之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几个政权，更是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毫无疑问，包括马具在内的鲜卑文化受到了中原汉

民族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但鲜卑民族固有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仍有浓厚的特色，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故不予讨论。现在，重点讨论鲜卑、高句丽、日本三个民族文化在马具上的反映。

第一，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鲜卑与高句丽两民族，一在辽西，一在辽东，地域相接，交往甚多。慕容晃建立前燕后，曾于公元342年（高句丽故国原王十二年）攻打高句丽，毁丸都而归，掳男女五万余口，和百济、渤海、宇文、段部之人都被安置在龙城附近。这时期，高句丽也大势扩张势力，向东占据了辽东半岛，向南打败了新罗、百济，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向北征服了东夫馀，公元427年，把都城从现在的集安迁到平壤。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鲜卑与高句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墓葬均为石筑，随葬陶器、釉陶器、铁器、马具等风格相似，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句丽民族文化固然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从马具和其它文物上看，她更受到了鲜卑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说，高句丽马具中的大部分因素是从辽西鲜卑那里传来的。朝鲜半岛的马具则应是以高句丽征服新罗、百济并迁都平壤为契机，而传入过去的。

第二，鲜卑与日本的关系。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至两晋十六国时期尤为频繁密切。鲜卑族建立前燕，继而统治

北中国之大部地区，与日本亦有使者往来。据《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记载，“辽水右会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迳昌黎县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东流迳倭城北……。”高平川即今建平县境之牻牛河，倭城当在牻牛河南岸，今朝阳市迤西，喀左县北公营子附近。此倭城当是三燕时期所建，以居当时称“倭”的日本人。日本马具从时代上晚于鲜卑，亦晚于高句丽，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日本马具很可能是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从辽西三燕传过去的，当然也不排除受高句丽影响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日本有学者总结说：“日本使用马具的风俗是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伴随高句丽南征，以朝鲜半岛内军事紧张为契机的“倭”的军事争战，及由于中国南朝的朝贡等因素传播的”（见大谷猛著：《日本马具的源流》）。中国也有学者根据安阳孝民屯晋代鲜卑墓的马具资料，认为“他们（朝鲜半岛和高句丽）明显地受了中原地区流行的马具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以孝民屯154号墓为代表的马具影响。中国的马具，对朝阳半岛上的古代民族的影响，也波及到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由于当时中国南方和北方使用的马具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也不排除倭直接从中国南方引进马具的可能性”（见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根据我们对马具材料的分析比较，认为与其说日本和高句丽及朝鲜半岛的

马具是受中国(特别指出是南朝)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从辽西鲜卑人那里传过去的,更具体、更实际一些。

第三,中国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在历史上就曾对国内及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这是举世公认的。在马具方面亦有此种情况。但是,单就辽西地区鲜卑马具的组合特点看,除东北的高句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与之有很大的共同因素外,中国国内及其它邻近地区尚未发现同类马具,所以说鲜卑马具的民族特色甚浓,而与高句丽和朝鲜半岛、日本的相互关系亦非其它地区所能相比。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草稿)